

記憶歷史 影響當代 啓迪未來

落日 硝煙散

抗戰精神傳

1945年8月15日,《大公報》用前所未有的特大字號報道「日本投降矣!」這一天的《大公報》成為國家一級文物。在密蘇里艦的日本簽降儀式上,三位中國記者中有兩位來自《大公報》,朱啟平撰寫的《落日》成為經典名篇。戰後70多年,《大公報》亦從未停止對中日關係的理性關注與反思,沒有停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鞭撻與揭露。一份報紙的抗戰,記憶歷史,影響當代,啓迪未來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 北京報道



■中國民眾慶祝日本投降。



■朱啟平經典名篇《落日》。



■《大公報》記者黎秀石(左二)與美軍合影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廣播了天皇的《停戰詔書》。此前,消息已經在重慶新聞界流傳。《大公報》總編輯王芸生,特意與刻字師傅商量,鑄刻了幾個超大號的字。15日清晨,讀者看到了帶有驚歎號的超大標題——《日本投降矣!》

重慶市民王大力至今記憶猶新:「當時街上遍街都是那些賣報的,一邊跑一邊喊:『號外!號外!日本投降了!』老百姓聽到以後,都從商舖裡、家裡跑出來,爭先恐後地搶買號外。」《大公報》和讀者在同樣的氛圍中相互激盪,共同完成了這個大大的驚歎號。

見證日本簽字投降

1945年9月2日,人們懷着激動的心情,見證一個期待已久的歷史時刻。這一天,在停泊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艦上,日本正式向盟國簽字投降。現場的三個中國記者當中,有兩人來自《大公報》,一個是朱啟平,一個是黎秀石。

在密蘇里艦上,兩位「戰友」來不及寒暄,他們要將這歷史的一幕詳細記錄下來,分享給千萬萬不在現場的中國人。「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十分,我在日本東京灣內美國超級戰艦『密蘇里』號上,離開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,目睹他們代表日本簽字,向

聯合國投降。這簽字,洗淨了中華民族七十年來的奇恥大辱。這一幕,簡單、莊嚴、肅穆,永誌不忘。」

浴血奮戰終獲新生

朱啟平認真地記錄了重光葵簽字的過程:「這一幕,後來永遠定格在歷史記憶中。全體簽字畢,看錶是九點十八分。我猛然一震,九一八!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,隨即佔領東北;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,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,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十八分。現在十四年過去了。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,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,天網恢恢,天理昭彰,其此之謂歟!」他給這篇文章起了一個很簡潔的標題——《落日》。

9月9日上午9時,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大禮堂,《大公報》記者張鴻增記錄下了《日軍簽降一幕》:「岡村一跨進陸軍總部的大門,定會感到他已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在這個世界裡,他不用帶槍和不離身的軍刀。他默默地來了,又悄悄地歸去。在過去的十四年裡,中國人民浴血奮戰,付出了巨大的犧牲,終於迎來了最後勝利。雙手沾滿鮮血的侵略者被迫放下屠刀。這是民族苦難的結束,也是國家新生的開始。」

心繫民族 反思不止

的影響從未停止過。

為了推動抗戰後的和平建國,《大公報》率先在全國呼籲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共商國是。中共代表也一直與《大公報》保持着密切聯繫。1945年8月28日,《大公報》記者彭子岡在重慶九龍坡機場第一次親眼見到了毛澤東,她用法語的細膩筆觸記錄下她所看到的每一個細節:「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,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。無疑這是他的新裝。『很感謝』,他幾乎是用陝北口音說這三個字,當記者與他握手時,他仍在重複這三個字。」

9月5日,在紅岩新村八路車駐重慶辦事處,毛澤東接受了王芸生的採訪,闡明了中共希望以政治談判解決國是的主張。後來,毛澤東造訪位於李子壩的《大公報》,為報館職工欣然題寫了五個大字:「為人民服務」。

此外,《大公報》對抗戰的反思也從未停止。1978年,朱啟平來到香港,加入香港《大公報》。就是這樣一個寬厚溫和的人,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教科書,多次撰寫文章予以猛烈批駁。王芸生晚年擔任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,他的作品影響了日本很多學者去重新認識歷史。



■毛澤東重慶談判期間為《大公報》題寫「為人民服務」。

抗日戰爭結束後,《大公報》繼續密切關注中華民族的命運,在推動抗戰後和平建國方面,發揮了獨特且重要的作用。特別是在和平年代,硝煙遠去,但《大公報》對戰爭的記憶和它對讀者

恢復在港出版 各界名流盛讚

抗戰勝利結束,對《大公報》來說,事業也全新開始。報紙在上海、天津恢復出版,總館從重慶搬到了上海。1948年,胡政之再次回到香港,主持在這裡恢復《大公報》。此後,很多《大公報》老員工也從內地來到香港,他們充實了《大公報》的實力,推動了香港的文化繁榮。其中,包括著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和金庸。金庸在《大公報》工作了12年,他的武俠小說最初在《大公報》旗下的《新晚報》上發表。

《大公報》與香港讀者一起經歷了苦難和辛酸,也共同經歷了香港人一手一腳打拚出來的繁榮,得到了各界讀者的認可。香港《大公報》恢復出版僅一個月,胡政之就因病在上海

去世。香港的事業,留給了老員工費彝民負責。1958年,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會見了香港《大公報》社長費彝民,在談話中,周恩來肯定了《大公報》的三點貢獻:第一,是愛國的;第二,是堅持抗戰的;第三,為中國新聞界培養了許多人才。

「中學的時候,第一篇投稿到報紙的文章就是在《大公報》。」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,「我們國家對香港的政策,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發揮的作用,準確地掌握國家現在的發展,都從《大公報》可以得到。」

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說:「《大公報》在香港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報紙。不單歷史悠久,而且充滿愛國主義精神,作出很多的貢獻,在香港發展過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」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則表示:「我可以說是霍家第三代人了,跟《大公報》的感情也是非常深遠的。回看《大公報》的歷史,這種效忠國家,為中國人民爭取權利、爭取社會地位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。」



■金庸講述自己在《大公報》工作的時光。



■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接受採訪。



《一份報紙的抗戰》

接連六日在熒屏熱播,引發社會高度關注。不僅因為它所保留的抗戰記憶蕩氣迴腸、體現的報人報格風骨永存,亦是因為這個報章對於中日關係的關注與反思,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。

抗戰硝煙已經消散七十多年,但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之間關於歷史、關於現實的齟齬依然不斷,且近年來甚至有爭端升溫趨勢。我們很遺憾地發現,對於戰爭的教訓認識、對於和平的渴望期求,並沒有完全實現。一方面,主要因為日本方面部分右翼勢力歪曲史實、興風作浪;另一方面,在中國內地,部分輿論及文學作品在歷史觀和戰爭觀上也出現了偏失,如「抗戰神劇」的胡編亂造、對漢奸的「翻案」及美化,都體現出在歷史教育不足的背景下,國人對抗日戰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、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和民族心理,缺乏足夠的了解和深刻的認知。

新聞工作者應當成為時代精神的倡導凝聚者。抗戰時期,《大公報》不僅是衝在一線的記錄者,也是中國抗戰不遺餘力的參與者和推動者。我們當以業界前輩及同仁為榜樣,不但是要反思歷史的災難及「痛點」,更要關注當下、知恥後勇、奮發前行。

■記者 王珏

前事不忘 知恥後勇